

世界营造学社筹备委员会
Preparatory Committee, the World Society for Ying-Zao Studies

营造

第二辑
(第二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
杨鸿勋 主编

YING ZAO

(Treatise o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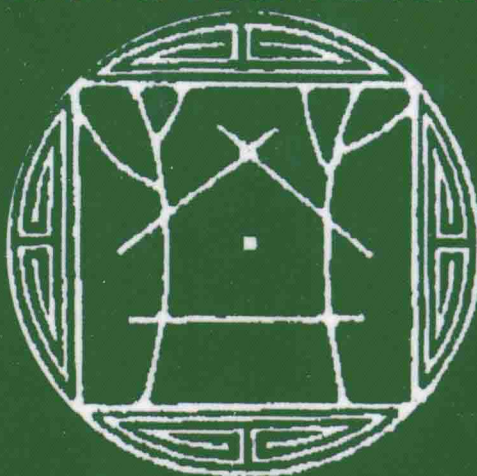
No.2

(Collected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I)

Yang Hongxun chief editor

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HARMONY BETWEEN



& NATURAL-ENVIRONMENT

MANMADE-ENVIRONMENT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世界营造学社筹备委员会
Preparatory Committee, the World Society for Ying-Zao Studies

营造

第二辑
(第二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
杨鸿勋 主编

YING ZAO

(Treatise o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No.2

(Collected Work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I)

Yang Hongxun chief editor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营造/杨鸿勋主编.--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302-30190-5

I. ①营… II. ①杨… III. ①建筑史—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TU-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333号

责任编辑:张占奎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社总机:010-62770175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邮 编:100084

邮 购:010-62786544

印装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10mm×285mm

印 张:22

字 数:767千字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

定 价:158.00元

产品编号:015158-01

目 录

宗教与神圣建筑

河南沁阳清真北寺的考察——中国伊斯兰建筑考察之一	路秉杰(3)
汉传密教东渡对日本佛教建筑影响的研究	王承(8)
从唐代佛寺谈中日建筑文化交流	乔云飞(12)
从佛寺布局看日本建筑的非对称性	刘茜(16)
藏传佛塔初步研究	吴庆洲(20)
佛塔地宫建筑形制研究——涟水妙通塔地宫建筑考察笔记	傅岩(30)
周朝礼制之空间行为规范系统	徐宏鑫 王明衡(38)
台湾的孔庙建筑群构成之探讨	王惠君(51)
台湾台南市关帝厅现代庙宇营建体系之研究 ——一个非正式的营建过程与其社会分析	吴培晖 徐明福 郑博谓(59)
伊势神宫和晋祠的比较——中国传统建筑语言在东亚的表示地位词素	梅晨曦(69)
比较文化：建筑构图的和谐比例——北京天坛与帕拉迪奥的圆厅别墅比较	古璐明(83)
北京天坛坛壝制度的形成	姚安(89)

乡 土 建 筑

关于韩国东沿海渔村民居的研究	郑在国(99)
论韩国书院建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韩书院建筑文化之比较研究	彭长歆 郭亮(108)
风土环境与建筑形态——晋西风土建筑形态分析	王金平(116)
对晋商民居内涵的再认识 ——从中西方传统社会的比较看晋商民居的格局特征	朱向东 张昕(129)
宇宙观在传统民宅营建过程中的实践——以金门、澎湖传统民宅为例	张宇彤(135)
简洁与繁缛——结构视角下的官式建筑与民居比较	林武生(147)
民居类型之空间形式演化——以个案演化为例	王韡儒(153)
窑洞中厨房建筑初探	许美琪(164)

景 观 建 筑

中国宫廷建筑中的欧洲热——谐奇趣宫殿(1747—1751)的建筑艺术与室内装饰	毕梅雪(175)
以古典中国文人园为基础的园林设计十步骤 ——关于遇秋园设计的一些思考	葛雷·米森汉姆 亚历克斯·塞拉尼茨(183)
欧美的中国古典式园林分析与比较	刘虹(196)
张伯斯的《东方园林论》评议	邱博舜(202)
十八世纪的西方园林革命和今日的中国园林外交	谢顺佳(217)
中国私家园林对日本、欧洲造园的影响及其比较	陈薇(219)
圣天子的园居之所与太阳王的光辉殿堂——圆明园与凡尔赛宫帝王起居空间比较初探	贾珺(227)

文物建筑保护及新技术应用

古迹保存在网络社会中的新想象	夏铸九(235)
梅溪实验——陈芳故居保护与利用设计研究	常青 王云峰(243)
略谈东西方文物建筑保护之异同	高念华(249)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以南宁兴宁路、民生路步行商业街规划设计为例	韩林飞(254)
中外建筑交流新平台——WWW	汤众(262)
《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吕舟(266)

古代建筑史及工程做法

日本绳纹与弥生时代的住房、神社和宫殿 ——从中日文化关系破解绳纹与弥生时代的建筑遗迹	杨鸿勋(275)
八角殿堂与八角天花藻井	夏南悉(282)
从景福宫勤政殿和昌德宫仁政殿看朝鲜时代宫殿的木构特点	国庆华 李相海(290)
从唐·宋·高句丽亲禘享仪的比较看太庙建筑	郑麒澈 李益柱(297)
多包系建筑形成过程研究——柱间台工向补间铺作的发展为中心	梁润植(308)
殖民时期台湾传统木工技艺的变迁	叶乃齐(315)
广州建筑与海上“丝绸之路”	曹劲 邓其生(327)
海上丝绸之路与宋代的海港城市	卢山(332)
中西古代建筑模数之比较	路瑶(339)
试析几座日本古建筑的尺度构成	肖旻(342)
编后记	(348)

宗教与神圣建筑

河南沁阳清真北寺的考察

——中国伊斯兰建筑考察之一

路秉杰
(同济大学)

Review and Study of Chinese Islamic Architecture

Lu Bing-Jie
(Tong ji University)

摘 要: 中国伊斯兰建筑基本上可分作两大类: 其一回族建筑类, 与回族一样分布在全国各地; 其二维吾尔族建筑类, 主要集中于维吾尔族集中的新疆各地。伊斯兰建筑特征均都集中地反映在宗教性建筑上, 以及陵墓建筑、经文学堂建筑。维吾尔族自其产生形成以来, 即为独立民族, 古称铁勒、回纥、回鹘、维吾尔, 今称维吾尔族; 回族形成的历史可以说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步, 大体可说, 产生于初唐, 形成于两宋, 发达于元, 鼎盛于明清, 至解放后始被中国社会确认为独立的民族。其建筑也是在利用中国固有的汉式传统建筑基础上, 加上伊斯兰教的特征, 而不是在阿拉伯式建筑的基础上加上中国建筑特征。

Abstract: Chinese Islamic architecture is divided into two basic categories: one is architecture of Huis, which has a wide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China just like the Hui ethnic group. The other i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Uygurs, almost all of which concentrate in Xijiang, the Uygur-populated areas. The features of the Islamic architecture are reflected mostly by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 and also by the tomb and the lecture school architecture. The Uygur ethnic group has always been an independent nation since it formed. In ancient days it was called Tiele, Huige, Huihu, Weiuer, Uygur, etc. Today it is called Wei as an abbreviation. The origin of the Hui ethnic group, which composed of several ethnic people e. g. Arabs, Persians, Huihes, Mongolian, Hans, etc, is relatively more complex. It can be said that its developmental course kept the pace all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the Islam in China. In brief, it emerg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ang dynasty, formed in North and South-song dynasties, prospered in Yuan dynasty and culminat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until the Liberation was it admitted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by Chinese society. Their architecture is found to enhance the Islamic features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Hans nation, and not to enhance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n the basis of Arabian architecture.

受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托 2001 年 7 月 10 日、11 日, 连续两日对河南沁阳水南关清真寺和清真北寺进行了考察。沁阳今属焦作市沁阳县治, 旧属河南省河北道怀庆府, 古郾国之地, 隔孟州、黄河与洛阳相

望。晚唐诗人李商隐即诞生于此。河南省回族之众,在全国为仅次于宁夏、甘肃的第三位地区,分布全省各地,尤以开封、沁阳最为集中。就总的形势来看仍和丝路、运河有关;具体则是由于元、明之战时大量回族兵卒将士流落乡间,散居各地,现在的回族均传为他们的后裔。自焦沁路跨过沁河大桥即可望见杨树丛中窑殿楼和望月、省心楼,隐约可见,最初我还以为就是清真北寺。匆忙就餐,走进一看,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但多新建斧痕,才渐生疑窦,一打听才明白此为沁阳水南关清真寺,与沁阳清真北寺是同在沁阳城内的不同的两座寺。于是立即转移去北寺。好在相距不远,于北寺街汪街7号找到了清真北寺。

沁阳清真北寺大门楼、八字墙依旧,但已将前檐下的封墙拆去,形成为木结构的前廊。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明次三间辟门;中柱落地,单檐歇山式,孔雀蓝琉璃瓦盖顶。但有个奇怪的地方,中柱并没像普通门楼结构那样一通到顶,前后出单步梁、双步梁,而是用一五架梁,将中柱直接立于五架梁下然立门挺框挡与门扇。令人更为惊奇的是脊檩下竟用叉手,而脊檩下又明明地题写着:“大清龙飞嘉庆岁次己巳年己巳月拾玖日吉时创建”字样,龙飞是皇帝登上宝座的吉庆之语,出自易经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卦就成了最为吉祥的皇家卦。嘉庆是大清朝的第五帝,称仁宗,名颙琰,清高宗弘历(乾隆)之子。岁次己巳年是嘉庆十四年,公元1799年,己巳月对当年来说是四月。显然这是创建年月。从付脊题字可知公元1987年又翻修过。两侧的歇山做法也与众不同,使用了山西五台县南禅寺大殿的丁字梁做法,前后采步金梁头再加抹角梁和垂莲柱。大门楼何以用唐宋建筑通行的如此古老做法?令人好生疑惑。明间大门两侧的抱鼓石,风化较甚,也似很古老的样子,充其量也古不过大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这是门前两侧重修碑和鼎建碑上都记明的事实。

入门内为前院,两侧厢房各三间,当为客厅及阿訇生活用房。正面不是二门,而是面阔三间的过厅,为单檐悬山卷棚顶。前檐立门窗隔扇,后檐仅明间开敞,安隔扇,两侧均为灰砖砌墙,单檐悬山式。前檐斗拱用三踩单昂,昂嘴纤细但昂头上另加三福云却显得浑厚,正心拱端也作成三福云的形式,里转耍头变成蝉肚式雀替,这些也都是很少见的怪异做法。通过过厅是内院。南北两讲堂,各三间,元宝脊(即卷棚)硬山顶,明间前檐用垂莲柱略加修饰以显突出。正面即是本寺的主题建筑礼拜大殿。面阔不大,三间,明间略宽约4米,两次间略狭各3米,而且是典型的纵向进深型的大殿,明显地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抱厦,或称卷棚、卷轩,呈半封闭、半开敞的状态。因为它是进入礼拜殿前的过渡部分。在这里须等候礼拜时间,然后脱鞋戴帽。不是鱼贯而入;而是一轰而入。在与前殿连接的后壁上全开满了隔扇门。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单檐元宝脊(卷棚)歇山顶。由于做工显得单薄肤浅,一望便知为近代所为。

第二部分前殿,也是面阔三间,明间3.88米,次间2.85米,通面阔9.58米。进深7.7米(前檐柱中心到后檐柱中心)。自室内地板面至柱顶3.5米,柱础石皋18米。柱身净高3.32米。柱间的额枋断面与一般或法式比较显得很窄,而平板枋则显得很大很高。相对来说,斗拱亦较大,前后两檐平身科仅用两攒,这和一般明清建筑要用五攒、六攒以上大相径庭,在左右两山方向,分三间,平身科每间只用一攒,可以说到了最低限度。柱头科亦不见斗口加宽的痕迹,与平身科一模一样。每攒斗拱向前出两跳,五踩,双下昂,昂嘴尖翘较甚,但也不同于北方常见形式。正心和跳头上均用重拱,最外跳用厢拱,整个斗拱的比例适中,造型浑厚肥硕和端庄。梁头是搁在斗拱上的。小小的屋顶竟用了三层梁,最上层是平梁,即三架梁,中间一层用五架梁,最下一层用七架梁,中心到中心7.7米,梁的高度却异常的大,左梁周长2.55米,右梁周长2.85米,平均2.7米,直径0.86米,高跨比是0.114,差不多是一般木结构的三倍,真可以说是典型的肥梁,肥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前殿是单檐歇山顶,两山结构采用山西五台南禅寺的丁字梁做法,在两山柱头科上搁置横梁,而且是斜向搁置,梁后尾搁置到梁的顶面上。其上再设柁墩承双向外伸的采步金梁,其梁头再用抹角梁、垂莲柱与老角梁结构在一起。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当初的回族匠人采取如此不寻常的做法,令人费解。前面大门楼、过厅均用了花式叉手,在这里就没有花饰了,是真正的叉手。这在建筑史上也是不寻常的事。因为除了几幢著名的唐宋建筑以外几乎是看不到这种做法的。在抱厦与前殿之间用简单的横梁,将两者连成一体,用来支撑两者之间的天沟。同时前殿后檐与后殿也是采用相同做法连成一体。

第三部分是大殿,可以说是前殿向后的延续,中间没有任何分隔,是一大通间。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前檐虽然没有任何隔断,但是檐下有斗拱,在柱下础石上却有安置下槛的缺口,说明当初在前檐是有割断的。斗拱式样与前殿相同,梁的高度几乎相同。所不同者是两侧用山墙,是单檐悬山顶,两山就不用斗拱了,梁架嵌在墙内。最大特征是在明间后檐柱分位向内收进一步架处,安置两根内柱,其上设柱头科斗拱,

前后出两跳，五踩双翘重拱计心造，用细长的蝉肚形雀替抵于七加梁下。斗拱外侧就用直接切断形式，向后则是标准形式，向前则跳头上的瓜拱作成花形翼拱形式。刘致平先生称此为屏风柱，盖因此柱立于屏风门分位上。我推断当初仅有后殿时，圣龛的位置当在此处，是为突出圣龛地位的一种措施。

第四部分窑殿，或称后窑殿。此寺碑记上称砖室，因其上多用砖构穹隆顶，这种结构多用在窑炉上，故俗称窑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全用厚1.1米的砖砌墙构成。内部净深3.9米，净宽也是3.9米，内用两道隔墙发成半圆形券，分成相等三室，前墙辟成三拱门，两山也辟成拱门，加木门隔扇。西墙上明间开半圆形凹龛，以为圣龛。上步先是方形井壁，然后在凹角处出三层排拱，将四角空井，修正成八角空井，上砌叠涩穹隆。在外观上各套上一个歇山十字脊琉璃屋顶，突出于众屋面之上。

从总体布局来看，是典型汉式传统的规则性布局，有明确的中心轴线，主要建筑均沿中心轴线由东而西纵深布局，在轴线的起端是大照壁，惜今已不存在，甚至连原有民房也拆除了，形成一个寺庙门前小广场。使清真寺的宏伟面貌得以展现在沁阳县城主要街道上。此中心轴线可以说是此清真寺创作存在的命脉，它基本上是东西向，向西偏北 12° 。最后一道与此轴线相垂直的墙最为重要，它就是礼拜墙（基布拉），代表礼拜墙的标志是凹龛（米哈拉布），译成圣龛。内部再设置一座象征穆罕默德讲经说法的“明贝尔”，译成宣礼台。这三项是构成清真寺的基本要素。其他则视需要与可能，可多可少，可简可繁，悬殊很大。

沁阳之有清真寺的历史，已经说不清楚了，据“重修清真寺碑记”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始于元至正年间（1341—1370年），其二是国朝初年，即明朝初年（1368—1424年），实际上两种说法一个意思——元末明初，都是在元明交继之时。元朝利用许多回族，明朝也有许多回民，随着他们的征战迁徙兴建一些清真寺是完全必然的。其中就有建于沁阳府东铺的清真寺。但正如“重修碑记”中所记：“诸教长感谓其地近市而隘”，所以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迁于今址。迁建工程进行了十二年，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才立碑作记，称：“而庀厥绩，岿然而中立者大殿也；翼然而旁峙者左右二侧室也；扁其门曰清真；甃其地以砖石”。看来有大殿、有配殿，也有了大门和题额，还修整了院落，应该说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清真寺。关键是大殿到底有多大。如果就是现在这个规模，那么“鼎建清真寺拜殿记”也就不会产生了。该碑记是同一人同一时代写同一清真寺，而且明确使用了“鼎建”二字，拜殿不可能是大殿，也不可能是窑殿，而且是位于大殿之前。“鼎建碑记”写得很明确：“万历十二年秋，于是乎，清真寺观厥成矣！诸教长金喜其庙貌森严，允称祝延圣寿之所。”这说明万历十二年建成的清真寺的确是有一定规模的。但是，原来发起率众捐金输财的马应魁、丁守志等人“犹以拜殿不设寺未完也”为由，“复率众捐金，建拜殿四楹于大殿之前”，虽然是“雕榱刻桷丹漆黝垩”，“具举不逾年而毕役”，也就是说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于大殿前建造了四楹三间的拜殿，鼎建碑记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拜殿应在此前完成，推断约为1589年前后吧，万历十七年前后。根据这些情况来分析，在现存大殿四部分之中，只有抱厦部分相当于万历十七年前后完成的拜殿最为合适。第一，他对大殿起到辅助、补充、完善作用；第二，工程简单，具举不逾年，没有超过一年时间，前述工程搞了十二年，拜殿没用一年，应当是相对简单才是。第三，它的位置正在大殿之前。如果把前殿当成拜殿，虽说其位置也在大殿之前，但没有前殿的大殿，很难称得上“岿然而中立者”和“庙貌森然”的，更无法“允称祝延圣寿之所”。而且前殿现存结构极其雄壮复杂，一年之内是很难完成的。再加上如果先完成抱厦再插入拜殿，不论在使用上、结构连接上和施工顺序上都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只有最后完成抱厦才算使清真寺完善起来，可以说基本不再有缺憾，这也担当得起。至于窑殿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刘致平先生说见崇祯辛未碑记，我此次久寻未得，但于前院北客堂廊下看到“光绪十三年重修清真寺碑记”，其中记有：“考寺之迁于斯者，在明嘉靖间；旋于崇祯元年毁于火，四年重修门庭堂室”，这里唯独没有殿，说明殿是没被火烧毁的。又记“殿后有砖室三楹，复从而增广之”，说明殿后原来就有砖室，即后窑殿，这一次仅是增加、扩大一些。但也没多久，即“无何，道光间地震，而窑之特起霄汉际者壁犹立而崖已崩矣！循视故基，规划立法，增建沐浴所五间”。这就是清光绪十三年重修（1887年）的有关内容。到1987年大门楼翻修恰是一百年。

应该说沁阳清真北寺的历史是清楚的。大明嘉靖四十年由府东铺迁此，经过十多年的建设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秋基本建成，万历十七年（1589年）前后创建拜殿，即抱厦。崇祯元年（1628年）发生火灾，门庭堂室毁于火，可见大殿未受影响。崇祯四年（1631年）重修被烧毁的门庭堂室。在此时好像顺便增扩了砖构窑殿。在喜欢建筑的康熙、乾隆年间未见重修或建筑记载，说明在基本建设上无所作为。至大清嘉庆十四

年(1799 年)创建今存大门楼,但用的构造方法与大殿基本一致。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发生地震,窑殿破坏,因是砖构穹隆,光绪十三年(1887 年)修复,同时增建沐浴所五间。寺内现存碑刻十余通,与建筑相关者三四通而已。其余皆是捐献钱财、房产、地产等有关芳名碑。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以前后殿为中心的大殿建筑基本上还是明代万历十八年前创建的建筑,尤其其木结构部分,仍延续了许多唐宋旧做法,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清真寺建筑中,也是难得的例证。后窑殿经过地震破坏,光绪十三年修复,但基本形制仍是明代创建时的。唯大门楼是清嘉庆十四年重新创建的清代建筑,其他门庭堂室也基本上是明代布局,末年建筑,光绪年间增加了水房五间。现为河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再添光辉的一笔。

另附碑文两篇

河南沁阳清真北寺碑文抄录(一)
重修清真寺记(原文)

我怀有清寺旧矣或云创於元至正间或云自
国初载籍莫稽考今府东铺其夙迹也诸教长感谓其地近市而隘近市则多喧隘则规度弗宏敞非所以崇清
教壮观瞻□□□□□□□□□□
树泉测圭召工庀物经始嘉靖四十年至
今上之十一载而□厥绩巍然而中立者大殿也翼然而旁峙者左右二侧室也扁其门曰清真甃其地以砖
石□□□□□□□□□□□□□□□□
以匡寺之雄观者亦罔不备足昔也喧而今也静昔也猥焉隘今不恢恢乎耀哉我怀绀宫金刹固云湧山立此
又一巨观如诸教长□□□□□□
闻欲托贞珉以垂不朽□属余为文以记余窃闻标执迷者必显其臬成大者罔恤其小诸君捐不资之费以建
寺裨迷于教者成其□□趋
国家亿万载昌明之祚斯其功顾不伟哉虽然事不患于不成而患其易坏故作者未尝不欲其永存继者恒至于废
殆此□□□□□立迄今往往□
之功伟矣使后来者绳其武时葺理焉则此寺
国祚相□长诸君之功亦将与此寺相终始若不然则高薨巨桷将不免为颓垣断堦而荒墟矣金碧辉煌将不免为
苍烟白露而荆棘矣其
圣寿者奚赖也是责不在后之人哉因余望诸君亦能作又以善继者为后人望也此一役也捐金协力以倡之者买
君启马君泰程君六十□资大劳
□终者拜君魁马君应魁至左右赞襄以共盛事者则教中诸君子也姓名获尽录录诸碑阴

皇明万历岁在癸未端阳之吉旦	壬午科举人
马之驥 撰	
	郡庠生
买臣书	
	郡庠生
马之骅 篆	

河南沁阳清真北寺碑文抄录(二)
鼎建清真寺拜殿记(原文)

万历十二年秋于是乎清真寺观厥成矣诸教长金喜其庙貌森严允称祝延圣寿之所马君应魁丁君守志马
君子泾马君应成等犹以拜殿不设寺未完也复率众捐金建拜殿四楹于大殿之前雕榱刻桷丹漆黝垩具举不逾

半年而毕役

瞻之者见其华而耸若飞翬鸟革固而奢蜜若苞竹茂松其兴隆前玉清虽一方胜概此寺盖与之媲隆而埒盛者计其费不下数百金魁等诸君实居□□□

十之二三事竣复以记文属余更求所以铺张教旨余曰驥虽清真产也而业儒业恶乎言者事尔诸君因稔闻其说而措之履者试为余一 魁曰□□□

极之儒者谭道术成橐钥焉吾之教亦橐钥是以故其寺不肖像不崇蘸祭而其人率饮醇抱真无贰尔伪有黄虞清静风至于麴蘖之防旨酒之恶也

天课之设即放利之戒也礼拜之举即斋沐之忱也号同类者无问疏亲遐迩咸周急焉无有行丐于市委身于沟壑而莫之恤者饷所谓博施济众者非耶是

吾教之崇论宏议予虽未获一□悬解其旨大约与儒相□□故其所以桴教人而使之从若桴鼓影响举海内外无 同其教如此是以国家亦

敕赐寺于京都焉盖重之也世之管窥蠡测者流见我圣人之倡教于西遂谓视儒若蓬口之相戾呜呼是未闻子与氏所评舛文者矣舛文不以东西异圣又

何疑予教之戾于儒彼有生于教为崇焉者足谓操入室之戈而反射吾不愿我教人之有是也君其谓之何余曰昔蒙庄谓旧国旧都望之畅然盖不忘其

所自始也诸君亦所谓追其所自始而不忍忘矣矧

圣寿之祝延又借是以行乎不忘本则孝祝

圣寿则忠一举而忠孝备是清真之建盖足记矣于是遂以诸君之言塞诸君之请其教之余旨奚容余疑□之现复臻□为哉魁等诸君亦世崇真教不□

故其资甲酈邨间或者谓其为崇教之报余因记文而并及之以为为善者之一助云

皇明万历十有八年端阳之吉旦	壬	午	科	举
人 马 之 驥 撰				
	郡			庠
生 买 臣 书				
	郡			庠
生 马 之 骅 篆				

汉传密教东渡对日本佛教建筑影响的研究

王 承
(同济大学)

摘 要: 公元 9 世纪,中国的密教传入日本,形成天台、真言二宗,在平安时代达到顶峰。同时,密教的输入对日本的佛教建筑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其建筑上的三个主要变化,以及与中国渊源关系。

关键词: 天台宗 真言宗 山中伽兰造 本堂 多宝塔

Abstract: In the 9th century, Chinese han Tantrism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forming two sections-TianTai and ZhenYan, and reaching its zenith in Pingan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roduction of Tantrism also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on Japanese Buddhist architec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it's three major chang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密教形成于 7 世纪的印度,唐开元年间(713—741 年),中天竺的善无畏、南天竺的金刚智和师子国的不空(史称开元三大士)先后入唐,翻译经书、传播密教教义,所创密教被称为“汉传密教”(与后来的藏传密教相区别)。由于得到唐玄宗的大力支持,它得以迅速发展。

公元 794 年日本迁都平安(今京都),建立了平安朝。公元 804 年,最澄(767—822 年,即传教大师)和空海(774—835 年,即弘法大师)同船入唐。最澄同他的徒弟义真,在天台从天台九宗湛然的门徒道邃、行满学习圆教,且从道邃受菩萨大戒,另外从倭然学习牛头禅,后到越州隆兴寺受传顺晓等人密教。最澄在唐一年中,所传的遍及圆、密、禅、戒四宗,史称“四种相承”^[1],所以最澄后在日本比睿山所立的天台宗(即“台密”),实际上与中国的天台宗已是不同。天台宗在这以前就已经由鉴真、法进等人传过,但是作为独立的宗派开创盛大的局面却是在此之后。最澄归国后,在高雄山寺建筑法坛,为八位高德授灌顶,这是日本灌顶之开始。最澄曾在比睿山创建延历寺(788 年),这时又想扩展比睿山规模,指定了建筑十六院的用地^[2],而且发愿要在日本国内建立六处宝塔院,又奏言要在比睿山建筑大乘圆顿戒的戒坛。由于南都佛教僧人反对及其他一些原因,这些都到大师灭寂之后才逐一得以实现。

空海入唐后,在长安受青龙寺惠果(惠果受教于不空)密教嫡传,三年而归。十年后获准以高野山为其根本道场之地。819 年建高野山金刚峰寺。823 年,受诏住锡东寺,作为真言宗(即“东密”)永久基地,寺亦改赐为“教王护国寺”。随之大举土木,营建讲堂、层塔等,到 826 年左右工程竣工。空海多为天皇、妃子、贵族受法和灌顶。在仁明天皇(833—849 年)即位后,甚至得以在宫中设真言院。

天台宗和真言宗虽然同为传扬密教^[3],但是二者区别甚大^[4]。但是由于资料限制,至今无法分清二宗教相^[5]的不同对建筑的影响,在此文中不再细分,统称为密教。

汉传密教的东渡形成的天台真言两宗由于在“镇护国家”“积福灭灾”^[6]等方面契合了当时朝廷的需要,因此得到国家和贵族的支持和扶助,有力的对抗了当时处于裹足不前又失去地利之便的南都佛教^[7],从而迅速成为平安时代佛教的新贵。随着密教的发展,新的建筑形式也发展起来。

除了延历寺、金刚峰寺外,平安时代前期其他大的密教寺院还有檀林寺(嵯峨皇后请义空禅师建),大觉寺(淳和天皇皇后施舍嵯峨山中的离宫建),安祥寺(仁明天皇皇后建);此外如嘉祥寺、定心院、总持院等,都在 9 世纪上半叶建成。贞观寺、元庆寺、禅林寺以及比睿山的文殊楼院等著名寺院,都在贞观年间建成。平

安时代由各地高僧创建的寺院也很多,其中有果邻在伊豆修的修禅寺、实惠在河内修的观心寺、性空在播磨修的圆教寺等,虽然各据一方,但都是真言宗、天台宗的道场。从建筑上来看,平安时代前期的佛寺建筑之遗构唯有室生寺五重塔和金堂,密教寺院堂塔,一幢也没有保存下来(延历寺、金刚峰寺都已不是原有建筑了)。从资料和遗物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受到汉传密教影响下的平安时期密教建筑的一些特征。

一是把寺院迁入深山,即所谓山中伽兰造;第二,出现了礼堂;第三,是多宝塔的出现。

平安以前的佛寺,大多以首都为中心进行建造,但到了平安时代,密教寺院多喜建在深山幽谷之中,虽然山中建寺在密教传入之前就已存在,如天智朝创建于近江的崇福寺,奈良末期由兴福寺和尚创建的室生寺等,但是普遍发展起来则是密教传入之后的事。这个重大的变化带来了佛寺布局的改变。在此之前佛寺布置都严守左右对称的形式,例如飞鸟时代的飞鸟寺、四天王寺、川原寺,奈良时代的药师寺、兴福寺、大安寺等,都是左右对称的。值得注意的是像当麻寺那样建在山上的佛寺,它的东塔(建于765年)、西塔(建于823年)地形高低不同,但依然营造对称的布局。这种置地形不顾而去追求平面布局左右对称所带来的仪式化,足以说明当时的时代精神。但是到了平安时代,搬到深山中去的佛刹不再去恪守对称的形式,规矩严谨的布置堂塔了。而是因地制宜的分布,堂塔的位置、朝向,都变成为自由抉择,佛寺真正在山环水抱、木掩花映中融入了环境。日本建筑的一大特点是建筑与环境的良好结合,或者说是建筑温顺的依从自然,但这在奈良时代七堂伽兰制寺院中是看不到的。因为那里周围可能完全不栽树木的,建筑作为人工建造的产物,是和自然相对抗的,要求具有在洁白的砂地上昂然而起的建筑美。密藏于深山老林中的建筑物,就不可能再是和自然相对抗的。当然这种山中型伽兰的出现,并没有代表当时所有佛寺的布局,毕竟还有很多的寺院依旧是建在平原地带上,特别是大的寺院,仍然是奈良式的伽兰布局。例如在东寺、下醍醐寺中所见那样,直至后期建造的法成寺和法胜寺、六胜寺虽然有了许多变化,仍然是左右对称为基础。

在密教建筑中,由于灌顶^[8]仪式的需要,出现被称为灌顶堂的建筑。这种新建筑物仅是在平面上具有特点,并没有随之产生新的建筑形式,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堂或灌顶堂的前面,另外加建礼堂。在东寺灌顶堂、神护寺金鑿堂、醍醐寺金堂、劝修寺御愿堂中才开始看到礼堂的存在^[9],礼堂的面阔和金堂相同,而进深仅有二间,但金堂和礼堂都同时纳入于一组大屋顶的覆盖之下,如同中世纪以后所看到的那种密教本堂形式,这种形式的出现究在何时至今尚不十分明了^[10]。但在镰仓时期(1185—1333年)都是被一个大屋顶所覆盖的,因此,这种形式可能在平安时代末期就已产生了。在奈良时代类似礼堂的这种面阔与主体建筑相等、进深二间的细长建筑物,就已出现,称为双堂。如法隆寺食堂细殿、东大寺法华堂、西大寺十一面堂院双堂、西大寺四王殿双堂等,但都不是设在主要殿堂前面。所以可以说,把这种礼堂附设在主要堂殿之前是密教建筑的一种特征。南都六宗寺院中的金堂是供佛的,即所谓佛橱式的建筑,除去特别的僧人之外不允许入内的。与此相反,礼堂这一类的建筑物正如其名称所示的那样,是礼拜的场所,正如“劝修寺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是“众僧及俗人设座的地方”,是为俗人所建的建筑物。

当然天台、真言二宗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在本堂中设置神圣的“佛地”的念头,平面上也要满足修行密法的教义和典礼仪式的需要。在天台宗中将本堂称中堂,堂内严格区分内阵和外阵。其前半是外阵,高铺地板构成。其后内阵较低,石铺地面,在内阵的昏暗之处设置佛,于其深处安置本尊。对于俗人一步也不得进入内阵之内;至于真言宗,将本堂叫做金堂^[11]。其本堂全为高铺地板,但内阵和外阵仍区分严格,须弥坛前置大坛,并于其左右两侧分设两界曼荼罗障壁。另有各个明王像,在昏暗的内阵中忽明忽暗的灯光中很富神秘气氛。

礼堂的产生,使得从纯粹为了佛的金堂,进而走向可以让众人进行礼拜,在建筑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由于室内风格的变化,密教建筑不免具有一种神秘的倾向,这和奈良时代佛寺建筑庄严中充满开朗的气氛非常不同。今天我们在西藏的寺院中也可以体会出那种神秘的味道,虽然藏传密教和受之于汉传密教的日本密教迥然不同,但在所营造的气氛这一点上极为相似。

根据在青龙寺遗址上的考古发掘,“遗址4”早期殿堂的平面显示出了内外堂(即本堂外加礼堂)的布局^[12],这个早期殿堂在时间上历经空海入唐求学于惠果时期,空海也曾图写青龙寺殿堂、佛塔形制带回日本,日本密教中的礼堂制度源于空海在唐所见的原型这一观点多为学者所赞同^[13],这种形式未在密教源起地印度发现,“倒更像是中国人用自己的非真言宗建筑来适应新的佛教礼仪”^[14],但在后来的中国不再见到,而被槽式建筑代替,倒是在日本流传了下去,成为密宗建筑显著特征之一。

作为密教建筑所特有的建筑物是所谓的“宝塔”。宝塔一词是塔之美称,在中国,它的意思等同于塔,而无其他意义,但在日本,却是专指圆形塔身上置有四角攒尖“宝形造”屋顶,再在其上立相轮的这种形式的塔。如果在其周围再绕以回廊就称为“多宝塔”,多宝塔和普通的三重塔、五重塔不同,底层方形,二层圆形,屋顶复为方形,其上即为与普通塔相同的塔刹,插入云天。此种形式是空海与密教一起从中国引进,它的内部只有四根金柱,圆形部分只有在副阶以上存着。多宝塔本来是安置释迦、多宝二佛之塔的意思^[15],和塔的形式是没有直接关连的,在中国亦多有名多宝塔的,如颐和园中的多宝佛塔、北京房山良乡的多宝佛塔、天津蓟县城西北的多宝佛塔、四川大足县城北北山的多宝塔等,但年代形制皆无可比之处,显然不是同一类的塔。在这里只是根据习惯来使用这个术语。在日本这种形式的多宝塔遗留下来的数量较多,其中石山寺多宝塔最古(建于1194年),据石山寺寺传,其多宝塔为建久年间由源赖朝重建的。从其结构,装饰来看为当时原物无疑^[16]。又有叫“大塔”的,是多宝塔的特例,较多宝塔为大,它与一般的多宝塔不同之处,还在于除了副阶以上保存着圆形平面之外,第一层内部也保存着圆形平面形式。如根来寺大塔,系仿造高野山的根本大塔而建立的,内部立有12根柱,形成圆形,其中立有四金柱,此塔建于文明12年(1480年),直到天文16年(1547年)才完工。虽然建造时间较晚,但因为是仿建,当保留了平安时代的风格。根来寺大塔是大塔的孤例。

公元817年(弘仁八年),最澄根据教化东国的需要,分别在上野的绿野寺、下野的大慈寺各建造一座“宝塔”,在睿山大师传中有记“一级宝塔”,塔的形制不可考^[17]。最澄大师为了镇护国家曾计划建造六座宝塔院,未及完成他就入灭了。直到他发愿后的第一百零六年,即公元924年才得以实现。在高野山金刚峰寺中,空海也企图建造金刚界、胎藏界两座塔,这就是后来完成的东塔和西塔,西塔是在887年完成的,东塔则更迟,直到延喜年间(901—922年)才完成。据说在创建大塔时就已经有副阶周匝了,再结合直接仿自此的根来寺大塔样式来判断,此大塔当为多宝塔之滥觞。

自此以后,随着平安时代真言宗的兴隆。建造了许多这样的塔,习惯上称为多宝塔。这种塔起源于金刚界曼荼罗三昧耶会中,而它的塔身据笔者看来是由印度坟冢塔波变形而来。在宝塔或多宝塔中不放置佛舍利而供养以大日如来为主的佛像,因此,在其内部没有塔心柱,塔心柱在第一层的天花之上。一层立有四根金柱(天王柱)是它平面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早期曼荼罗的制作,“在印度,欲制作曼荼罗时,首先是择地,再于地之四隅立桩,绕线结界。界中铺上清净泥土。筑坛,其表层涂抹白土,安置诸尊……”^[18],联系多宝塔中四根天王柱和塔的方圆结合的体型来看,那正是古代人们对于曼荼罗所反映的宇宙空间模型的感性认识和再创造。根来寺大塔中在一层中保留了方圆结合的平面,也许是平面图形未彻底走向立体造型的残余表现。关野贞先生认为它开始出现在中印度后来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实物中并未见到有此种造型的,但是我们在敦煌壁画中看到许多类似多宝塔的。如中唐第361窟、宋代第61窟、西夏第306窟、五代第72窟^[19]。唐代的宝塔除了见于壁画外,文献中也多提到,如岑勋《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岑参《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多宝塔》诗等,惜形制不可考。由于有壁画流传,那么曾在中国建造过类似的塔的可能性就不是没有,当时求学的日僧至少是看到了这样的画作。另外,在少林寺塔林中多可见到类似多宝塔的墓塔,如53号塔、55号塔等^[20],证明了在非主流的塔制中它那若隐若现的延续。

由于篇幅的限制,上面简略的叙述了汉传密教传到日本之后对日本的佛教建筑所产生的一些影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历次输入中,就建筑角度讲,随密教而去的影响不像后来的“天竺样”和“禅宗样”来的强烈和明显,以至于常常被我们忽略。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日两国一直延续下来的在建筑文化上的交流,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注 释

[1] 村上专精著,日本佛教史纲,杨增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3

[2] 延历寺以一乘止观院(后改称根本中堂)为始,最澄在世时先后营建于法华三昧堂、相轮堂、西塔释迦堂,一切经藏等,似乎所有这些建筑都非常的简单朴素,并且规模不大,早期的中堂不过是一座小型的草庵而已。此后直到延长二年(924年)这一时期内,先后完成了戒坛院、西塔、法华堂、首楞严院(横川)、定心院、总持院(包括多宝塔、灌顶堂、真言堂等)、常行三昧堂、大讲堂、随自然三昧堂、文殊堂、西塔(多宝塔),终于成了洋洋大观的寺院。根本中堂成为现在那样的平面,是在天元元年(978)慈慧再兴之后的事。此后延历寺曾屡遭火灾,其中特别是元龟二年(1571年)由于织田信长的攻打烧掠几乎全山烧光。现在的根本中堂就是宽永十七年(1640年)重建的。

[3] 真言宗从长安青龙寺惠果正统密教之法,天台宗除发展天台本宗之宗义外,以发展密教为最可观。

[4] (一)台密以“三乘教”为显教,以“一乘教”为密教;东密以大日如来法身说教为密教,而以释迦应身说教为显教。(二)台密主张“圆密一致”,东密主张“密胜显劣”。(三)台密认为大日、释迦二者同体,东密则谓二者别体。(四)台密对金刚、胎藏、苏悉地三部大法并重,三者之中,尤其重视胎藏与苏悉地;东密则仅重金刚、胎藏两部大法。见《佛学大辞典》“台密”条。

[5] “事相”之对称。密教对法门之建立、义理之深浅等,或各种教理组织、教义解学等,加以研究、解释,称为教相。反之,实际之修法,则称为事相。

[6] 张大柘《日本佛教略述》。

[7] 即奈良佛教,指奈良时代传入的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宗等,因奈良在平安之南,故称。

[8] 密宗特别重视灌顶,如《大日经疏》卷十五谓,若灌顶不成则不可闻知真言及印契等;灌顶之前师若传法予弟子即犯大过。密宗以为,灌顶为师资传法之最重要仪式,且由灌顶做法可得速证大觉位。空海《秘藏记》解释灌顶之义,谓“灌”表诸佛之大悲,“顶”为最上之义。菩萨从初地乃至等觉,入究竟妙觉时,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行圆满,得证佛果,此是“顶”之义;诸佛之大悲为“灌”之义。见《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灌顶”条。

[9] 作为附加礼堂的本堂,最古遗例则是石山寺(1096年)。本堂和礼堂以纵深方向联成一体,是和东大寺法华堂属同一形式的。但是它的本堂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礼堂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其间连接体面阔一间,进深七间。形制上有些特殊。

[10] 例如东寺灌顶堂,是空海圆寂后到承和十年(843年)建立的,当时是沿袭了双堂形式,即在五间四面的正堂前面,另建礼堂,但是真正被纳入一个屋顶之下却是宽永十一年(1634年)重建后的事了(那次重建并未变动平面)。

[11] 藤冈通夫著,路秉杰译,简明建筑史,16页

[12] 《唐长安青龙寺真言密宗殿堂(遗址4)复原研究》杨鸿勋 载于《建筑考古学论文集》“遗址4”早期殿堂的平面同日本生寺灌顶堂很相似。

[13][14] 可参见《青龙寺密宗殿堂——唐代建筑的空间、礼仪与古典主义》一文中所论[美]夏南希载于《建筑历史与理论》第6、7期

[15] 《大正藏》第九卷《法华部》,姚秦·鸠摩什译《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踊现其前”,这就是多宝塔。又说:“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是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此即多宝塔中释迦、多宝二佛并座。故多宝塔又名多宝如来宝塔。

[16] 关野贞著,日本建筑史精义,路秉杰译,60页

[17] 太田博太郎先生认为“可以说是多宝塔形式,可能这是日本最早的多宝塔。”(见:太田博太郎著,路秉杰译,日本建筑史序说,32页)但笔者认为不确,因为当时多宝塔尚成为密教象征之塔制,不可能被认为是“一级宝塔”,倒是采用传统的五重塔形制的可能性更为大些。

[18]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曼荼罗条。

[19] 萧默著,敦煌建筑研究,159页

[20] 编号按同济大学1995年嵩山少林寺塔林测绘成果。

从唐代佛寺谈中日建筑文化交流

乔云飞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

摘 要: 建筑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本文旨从中日佛寺建筑的历史文化渊源,发展轨迹以及唐代佛光寺东大殿与日本招提寺建筑结构对比来阐述唐代中日佛寺建筑文化交流。

关键词: 唐代佛光寺 日本招提寺 佛寺建筑

Abstract: Architecture is a cultural carrier.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ounding cultural exchange of China and Japan in the temple architec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by means of tracing back to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origin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emple architecture, discovering their developments, and comparing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of the Great East Hall of the Foguang Temple in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with that of the Zhaoti Temple in Japan.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技术体系,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唐代建筑技术迅速发展,达到了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高潮。唐朝在隋大兴城基础上营建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从同时期遗留下来的遗址、雕塑、壁画等都可充分显示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为以后的辽、宋及明、清时期的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建筑也对日本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唐代佛寺与日本同时期佛寺建筑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对研究中日建筑文化交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日佛寺建筑历史文化渊源

建筑是文化的一种载体。佛寺建筑的产生,究其原因,是佛教的传入所带来的。佛寺建筑为佛教活动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所空间。

我国佛教自东汉初年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刘欣(哀帝)派博士弟子秦景宪接见大月氏王使伊存时,曾亲授其口授的《浮屠经》,后来经刘庄(明帝)又遣郎中蔡愔等到西域抄写浮屠遗范,于东汉永平十年(67年)东还洛阳,以白马寺为始的佛教寺院随之在中国出现。佛教寺院的出现,是中国第一次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场所。由于佛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场所,建筑的等级制约受限较少。佛教一切民众平等的教理对建筑发展来讲,佛寺建筑推动了唐代建筑的发展。

日本的佛教,是由中国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据佛教史籍记载,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中国司马达等在日本从事制鞍业,在大和阪田原设立草堂,安置佛礼拜,其女儿司马岛首先出家为尼,称为善信尼;其儿子也出家为僧,称为德齐,是日本僧尼的开始。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圣德太子大弘佛教,曾派遣国使小野妹子等入隋通好并求取经论。翌年四月,小野妹子一度回国,九月又偕高向玄里等四名留学生和僧旻、清安、惠隐、广齐等四名学问僧一起入隋,学习中国学术和佛教。从此以后日本僧人来中国留学络绎不绝,而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广泛地传播于日本。汉字也在日本普遍流行。特别是大化年间,实行改革,进一步仿效中国,加强中央集权,遣唐使的派遣日益频繁。7世纪后半叶,时值日本奈良时代前期,唐文化对日本的直接影响更为显著,以长安为中心的丝绸之路西达地中海,东端则直达日本奈良平城京。关于